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 权 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他特别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还强调,“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深入理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现实意义、科学路径以及工作着力点等指明了方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引领世界经济继续开放发展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衰减,特别是世界经济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逆全球化思潮流行、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一系列连续性冲击事件后,实际上产生了持续累积效应,即“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低物价”和“高债务—高风险”的格局不断增强,这使得开放发展、要素自由流动、贸易和金融在全球的资源配置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国家采取极端贸易保护措施、眼睛向内、回避矛盾,民粹主义等势力抬头;再加上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带来严重调整和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何去何从,亟待有新的创新思路 and 战略应对。

我国明确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规律和世界经济开放新趋势,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和推动作用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

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既推动国内经济大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为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弥补国内要素短缺、吸引国际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面对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需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展韧性足、创新转型机遇多、不平衡发展空间大等潜在优势,积极发挥国内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积极带动国际市场复苏、繁荣,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重作用下加快推动世界经济摆脱“长期停滞”,尽快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和活力。因此,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将会为未来世界经济长期复苏、持续繁荣和发展带来更多、更大新机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引领世界经济继续开放发展。

以全面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循环,这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显然,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增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功能,特别是要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积极带动和相互促进作用,这是当前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逐渐发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出现的新趋势,也是许多大

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国际上许多大国经济发展,往往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其内需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逐渐达到80%—85%的水平。我国2019年人均GDP到了一万美元;根据计算,内部需求规模已从2000年的8.73万亿元攀升至2018年的76.18万亿元,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依赖度逐步增强,也是到了内需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牵引作用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需的依赖性来看,近10年我国净出口占比逐渐降低,进口开始逐步扩大,外贸“大进大出”的格局正逐渐改变。从内需和

外需发展格局来看,我国发展要顺应客观趋势,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简单扩大内需战略的再版。我们需要从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刻高度认识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扩大内需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被提及,但是由于受到很多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瓶颈和问题制约,扩内需战略实施效果并不是十分突出。新发展阶段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本质上是一次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说到底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抉择。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推动供需匹配;需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提升扩大消费需求的物质基础;需要加快国民经济体系改革,推动生产体制、流通体制、分配体制和消费体制深层次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各环节、各部门畅通高效;需要推动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投融资、进出口管理、大物流、大交通等各种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畅通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和发展;需要优化消费环境,营造消费者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氛围;等等。因此,需要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的高度认识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防止回到简单扩大内需的老路上去。

以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可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全方位和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新格局。要发挥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的带动作用、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就必须更实行对外开放,不开放则无双循环。

由此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新时代的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首先,需要加快全面开放发展,这就意味着开放要从制造业为主体转向服务业开放、制造业开放并重开放;从沿海开放为主转向沿海、内陆、陆海联动并重开放;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开放;从要素和市场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其次,需要加快高水平开放,这就意味着越是开放,越要注重安全,特别是要注重服务业开放发展与有效监管的能力提升,有效防范风险,确保开放发展、安全发展相统一,确保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需要在开放中推动创新,实现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需要更加注重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经贸规则,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需要在规则制定中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次全新的对外开放,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发展;也只有依靠高水平开放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作用,进而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

□ 戴 翔 缪燕妮

险,面临的隐性壁垒等,都对我国的监管政策提出更高要求。此外,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多元融资渠道,使得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上升。扩大开放必须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和优化作为保障,如此才能尽可能规避扩大开放带来的各种风险。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成为新阶段中国扩大开放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在开放格局、开放方式等方面要作出调整 and 战略转型,要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要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化解可能来自的外部风险,一方面,需要我们立足国际关系和全球疫情防控,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特别是注重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防范“卡脖子”技术风险。产业链循环不畅乃至出现梗阻,畅通国内大循环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开放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化解扩大开放可能引发的内部风险,需要我们加强国内监管,聚焦国内经济活动的管制、规则和法制等安全问题,健全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强支持保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增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对境内外资形成常态化管控,完善境内开放的风险管控安全体系。

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 于 倩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既是对广东和深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全国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部署。

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下,有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这一大变局的演进。双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叠加,催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呈现纵向收缩、横向集聚的内向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现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在我国14亿人口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尽管如此,我国结构性供需失衡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其根源在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高,供给体系不能灵活、有效地适应需求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是限于生产能力和水平,以满足中低端需求为主,而包括高端设备、机器零部件、材料、消费品在内的高端制成品不得不依靠进口,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二是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高品质

供给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低端供给闲置;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如高品质农产品和法律咨询、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教育、医疗、家政、养老等高端服务,尚未能较好满足快速增长的国内多元化需求;基础设施服务限于网络化和配套连接程度,导致服务供给效率不高。

全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主攻方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掌握技术和发展的主动权。二是丰富技术创新主体,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组建产业共同技术研发基地,实现关键技术的关键突破。抓紧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布局孵化器,提升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能力。三是加强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模式,注重产业链和同业协同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四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高科技转化能力和转化效率,实现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跨越,摆脱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加快产业融合升级,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动力源泉。一是推进制造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立足我国制造业大而全

的优势和服务业发展渗透性强的特点,向服务型制造、智能化制造和柔性制造转型,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二是推进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农村金融、物流、租赁等涉农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等新兴农业产业。三是加快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利用国内数字企业和接入互联网人口规模的优势,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包括生产流程、管理和商业模式在内的新供给,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壮大新增长点。

加大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坚实保证。一是尊重企业与市场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地区、行业层面体制机制障碍。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行政审批、投融资体制改革,扩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破解企业用地难、融资难等问题,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要素。三是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际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鼓励人才自由流动,落实人才扶持和奖励政策,提供相关配套保障,吸引国内紧缺高端留学人才回国发展。

紧抓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主要任务。一是进行广泛深入市场调研,摸清消费

者偏好、消费方式以及消费习惯,以精细化设计、精细化生产营销,促进供给多样化。二是支持企业连锁化、品牌化集聚发展,促进商品消费提档升级和服务消费提质扩容,集中建设一批具有影响力 and 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树立供给信誉。三是加快加强行业标准制定和监管,提高农产品、装备制造、工业制成品、工程建设、服务的生产和管理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以高标准倒逼供给品质提升,推动高端消费回流。四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建设,推广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注意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统筹各方配套企业资源,形成采购链、供应链、生产链的国内闭环。

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有力支撑。一是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计划,提升人才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实现人才要素的供需均衡。二是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鼓励企业参与办学,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办学格局。三是注重培养具有职业化和国际化素养复合型专业人才。

